

對大陸「神父離職」現象的再省思

陳開華

幾年前還在神學院學習的時候，就當時的司鐸離職這一現象借《鼎》發表過自己的一點想法，現在本人已身為司鐸，回想起前文，願意就這一現象再談一下個人的理解，同時也感謝《鼎》英文主編安修女的盛情邀請命筆者為文。

獨立而不自主的教會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時，基於國家主權的完整和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最早由南京教區發起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浪潮，旋即風靡全中國，外國傳教士於一九五二年底已經基本上全部離開中

國，人們熱情高漲，努力建設中國人自己的教會，與年輕的共和國一起來建設新的家園。

其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並非五十年代的創舉，早在二十世紀早期，即有英斂之、馬相伯等教會有識之士提了出來，主張當以華人自治教。針對當時的「法國保教權」問題，宗座駐華代表剛恒毅總主教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讓中國人來治理中國的教會，祝聖華籍主教，所以在一九二四年召開於上海的「中國天主教第一次代表會議」之後，在得到教宗庇護十一的大力支持下，剛恒毅即著手

籌備國籍教區，一九二六年選出了六位中國神父至羅馬由教宗親自主禮祝聖為華籍主教，治理六個國籍教區，即蒲圻教區成和德、安國教區孫德楨，海門教區朱開敏、台州教區胡若山、宣化教區趙懷義、汾陽教區陳國砥。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大修院」，栽培中國司鐸。一時之間，教務蒸蒸日上，雖然時值國內混亂、中日戰爭等，但教會事務卻發展迅猛。一九四六年，教廷在中國成立「聖統制」，更加推動了中國教會國籍化的進程。

新中國成立時的世界局勢和新政權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教會由於外國傳教士的離境而走上了完全的獨立，儘管這來得有點突如其來，讓人措手不及，但中國的教會開始走上自主自立的新路，與全國人民一起以萬丈熱情建設美麗的祖國。一九六二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二次代表會議」匆匆拉下帷幕，即陷入了危機之中。

眾所周知，由於那個特殊時代的宗教觀，導致了政權過分干涉教會的主導權，一些主教、神父、

修女、教友被冠以「反革命份子」名義而受到打擊，有的死於非命，有的被迫入獄，這也同樣是中國的教會在辨析中國天主教的走向上的一個遭遇，並由此埋下中國教會日後走向分疏的伏筆。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後，劫後重生的天主教與其他宗教團體一起走上了重新建設之路。在經歷了「文革」的極左浩劫之後，新一代的執政黨人，又從新的角度來考慮「宗教問題」。從「國務院批轉宗教事務局、國家建委等單位《關於落實宗教團體房產等問題的報告》」（國發〔1980〕188號）開始，天主教與其他宗教團體一樣，走向了自立復興之路，而《中發（1982）19號》（中共中央印發《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的基本政策》的通知）釐清了新的社會時期中國共產黨客觀明晰的宗教觀，直至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體現了中共對宗教認識上質的飛躍。

我們也真實地感受到，中共的宗教觀已經有了

非常清晰的客觀認識，但在全國各地方的宗教部門的認識卻不盡相同，因為宗教信仰尤其天主教信仰在中國還不是社會主流，不少的宗教幹部對宗教的認識還不是那麼清楚，有一句俗話可謂道破了天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宗教幹部對信仰總是不甚了解，對〔國發（1980）188號〕和〔中發（1982）19號〕諸文件精神不甚了解或說不願了解，不少的人仍然在五、六十年代「極左」思想的指導下，視宗教為迷信，視天主教為另類。有的落實宗教房產不力；有的乾脆說宗教遲早終得消滅，於是將教會的經濟與房產利益據己名下；有的則借「愛國會」之名控制教會，或者起用道德敗壞、信仰淡漠的神父、教友從事教會的工作。

筆者記得，九十年代早期，一位外國朋友送了本堂神父一部幻燈機，這消息不知如何被宗教部門得知，要求神父將「幻燈機」和「幻燈片」交給他們去審察，審察了一年下來，毫無音訊，在教會再三追索之下，才交回教會。而另一次，神父要到外

地去給教友傳臨終聖油，但卻遭到宗教幹部的反對，理由是神父不能跨地區活動。結果病人因領不了臨終聖體，竟成憾事。當然，在已經召開了「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今天，這類似的情況不致於再重演了，但畢竟這是中國教會走過來的一段曲折的歷程。而在這一條路上爬涉過來的神父們卻經歷了一場特殊的心路歷程。

所以，九十年代末期，一批神父因為教會的「不自由」而離開了神職的崗位，他們也為教會爭取所應當享有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有的更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選擇放棄神職，固然反映了時代的局限性，但卻也體現了人們在期待天主的主導權上的信心，因為任誰也不可能超越時代，人就因在時代當中被塑造而顯得精彩。

所以，就歷史的進展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在宗教認識上的進步，由極左——打擊——開放、懷柔——支配、控制——保護、尊重——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天主教上智的計劃，只是苦了這一過

程中的司鐸們，但天主正在這一過程中與我們相遇，祂在考驗、磨勵、選擇祂的忠僕。

忠叛之辨，最傷人心

八十年代開始，不同的信仰觀與苦難歷程，導致中國教會的分疏，對教宗的「忠貞」與否，成爲判定教會的「真偽」的一個時代準則。被海外教會炒作爲「官方教會」的「公開教會」，實質上對宗座的認信也有一些明顯的時代演進過程，但「忠叛之辨」一直是中國教會中一個不斷持續的思維範式。

與年輕的共和國一同接受考驗的老一代神職人員，在吃盡了苦頭之後，八十年代卻面對了不同的處境，當中參雜了多少的歷史政治因緣及苦難情緒，實在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點非常重要：教會在不同的時代中存留，信仰主體——人在不同的境遇中體驗人自身的被救贖與對天主的渴求，尤其是在艱難的處境中，教宗作爲教會在世的最高元首，他對中國教會的現狀從未做過任何

正反方面的評價，他在不同的講話中都在強調中國的教會需要「對話」，共同來表達天主愛人的訊息。

「不公開教會」勇敢地與政府對話的方式，明確而清晰的表達教會堅強的一面，被國外的教會將之定名爲「忠貞教會」。然而，「官方教會」所受的苦難又有誰能知曉，一方面得分辨政府在不同時代中的宗教觀念，另一方面還得面對教會內部的紛繁工作，稍不留意即會令教會受損。如此苦辛不言而喻。這時，如果還有來自兄弟同道之間的口誅筆伐，那就無異於雪上加霜了！

筆者記得有一次與一位「不公開教會」的教友在一起時，他說：你們是依靠政府來辦教，從這論調上我們可以看出，人們觀念已經在悄然發生變化。由過去的「你們不承認教宗」轉化成爲另類話題。

平心而論，誰也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的出生地，同理，任何一位神父也不可能主觀去選擇自己的信仰成長環境。出生於「不公開教會」的環境，

則理所當然地會成長成爲「忠貞教會」的神父，而出生於「官方教會」環境中的人也大概不會有太多的機會在其他環境中成長並成爲神父。

當人們不兼顧歷史，只看點、面，固然可以痛快淋漓地各表忠貞，但卻置歷史與現實、對話與發展於不顧。「忠叛之辨」卻切斷了歷史，或者可說是一種極端靜態的歷史觀。可惜的是在這種「歷史觀」下被遺棄的人們，有的人以天主代言人自居，有的人以無奈收場。

來自教友們的刀刃

「新與老」的交替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教會的一大議題：老年神父與青年神父之間的交替，年長教友與年輕教友之間的信仰交接，拉丁禮儀與現代禮儀的轉換等等。

但是，對「梵二會議」精神的落實，對福傳空間的開拓創新，都可能令許多教友爲之喝彩，也可能會傷害不少老教友的宗教感情。

今年聖周四晚上，在堂裏舉行「濯足禮」，有

的教友感動得涕泗交流，有的教友卻來質問神父，是否在故弄玄虛，理由是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甚至一九五零年前都沒有舉行過這個禮儀。

教友們不愿輕易放棄他們心中的傳統，因爲對他們情感與生命所繫的「傳統習慣」的剝離，會讓他們無所適從，於是萌發失落感，讓他們感到自己「老了」、「沒有用了」，他們就會用堅決的態度來維護「還能把握住的傳統」。儘管他們心中也會認可年輕神父的「更新」的價值，但他們更願守護自己的精神家園，進而批判任何的「更新」。因爲年輕神父忽視或者低估了老教友的心理感受，所以，這個「信仰情結」給人製造了一份堅厚的壁壘，成爲兩代人或說是教會在發揚傳統與實施發展之間的張力。那麼較易受損的當然是我們年輕而勢單力薄的神父了，從高度熱忱地爲教友們服務，而變爲不得志，使人萌生隱退的想法，也就有了情感意義上的合理性了。

第二個來自教友對神父的傷害是教友之間的派

系爭鬥，這一點聖保祿也碰到過，並向教會提出了自己看法和規勸，可見，此風古已有之。有的教友可能喜歡甲神父，有的教友可能更願意與乙神父交往；有的熱情地參予教會的活動，有的更願意冷眼旁觀。從不同的角度看教會就會形成不同的教會觀，不同的小團體會形成各自獨異的信仰觀、教會觀、神父觀、好惡觀，甚至批判態度。對教會的真诚關心與教會活動的參予，則隨著神父的更替與對不同神父的情感而有所取。性情相投者固然可以組團成事，但卻不一定完全是從信仰出發。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在承行主旨，但卻苦了年輕的神父，堂區的工作委決不下，有時開罪於人，到頭來顧此失彼，一頭霧水，「多邊」不是人。一心只想把教會工作做好而只知道付出的神父，被好評與惡估弄得心神交瘁、筋疲力盡，當批評值大於肯定值時，受傷最大的當屬年輕司鐸無疑。

內在空疏，付出不繼

神父的工作一如主耶穌一樣，一個字「給」。

但「給」的前提是自己的富足。如果一味的忙於工作，忽略了每天的祈禱工夫、拜聖體的時間、退省神工等，天長日久，信仰就會流於空疏，可能會將「努力工作」當作是對天主忠誠的一個藉口，把牧靈工作與福傳工作視為司鐸的唯一旨趣。最終忽略了信仰與獻身生活的根源，依靠自己的能力立足於世。

筆者即有感於此，每逢主日，一大早，教堂裏即燈火輝煌，教堂外門庭若市，教友們和神父之間有就不完話，訴不盡的情。擔到了晚上，卻形成反比，外間燈火通明，熱鬧非常，裏間神父一人身居陋室，獨守空房，或對月獨酌，或電視相伴。

其實如此孤獨之際人才可能真正地會晤天主，欲入主心，須先品寂靜，讀主言。如果能夠青燈相伴，獨倚聖龕，則因為心燈常燃方可能寧靜致遠，虛靜篤沉，可以深悟玄機，宇間萬象才能終虛於無，獨守斗室終必恬然翕主。明天，將以一個「復活」的姿態面對紛繁複雜的工作與教友們的需要。

如此才能「給」而不空，虛己侍主，誠而樹人。其實說到底一個神父最重要的工作是修道而非做事。

所以，內在的空疏只能往內裏去尋求最終的解決之道，天主在我們最隱秘的孤寂之處與我們相遇。一個神父對祈禱的忽略，則顯示了仍願意處身一個比較外在的平台上逃避孤獨虛靜。內在空虛而尋求外在解脫之道則注定司鐸生活的必然失序，要麼離職了事，要麼無奈掙扎，維護一個做事能力很強的神父形象。

總結：在需要不斷淨化的教會中成長

就司鐸離職現象，筆者設身處地的從一個司鐸的角度來再加探討，以本人一年多的鐸職生活來理解上述四方面的挑戰。基本上可以將上述四個論題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外在的挑戰（前三個：獨立而不自主的教會；忠叛之辨，最傷人心；來自教友的刀刃）；二為內在的挑戰（後一個：內在空疏，付出不繼）。其實無論來自那方面的「不自由」，都會邀請我們做一個抉擇：選擇依靠天主，還是選擇憑

自己的能力來解決問題。

在舊約《民長紀》中以色列子民的成長之道是「信賴天主——背叛天主——遭遇災難——呼求天主——天主施援——信賴天主」。在我們今天的時代處境中，我們也同樣地要不斷以「呼求天主」開始來治療我們所面臨的「對內在與外在困難的畏懼」與「依賴自己的欲望」。歷史學家說「歷史都是當代史」，天主子民在每一個時代當中都面對他們自身的歷史，但各時代的問題都有其相似性，儘管其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今天的司鐸選擇以離職來表達「背叛天主」；但正如我們在《對大陸神父離職現象的省思》一文中所申述的那樣，能夠在「神父離職現象」這一情況中自省上進，加強自己內在特質的神父是如此的難能可貴。教會要在「時代徵兆」中不斷淨化自身，司鐸作為教會的主體則負起了不可推卸的責任，天主將透過忠信於祂的司鐸們，一如在任何一時代中，在教會的更新成長中樹立天主聖教常新不斷的勃勃生機。 □